

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

陈思和 汪涌豪 主编

陈正宏 / 著

/殷本纪/六国年表/河渠书/越王句践世家
/伯夷列传/刺客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
/太史公自序

史记 精读

 复旦大学出版社

史记 精读

陈正宏 / 著

/殷本纪/六国年表/河渠书/越王句践世家
/伯夷列传/刺客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
/太史公自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精读/陈正宏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
(原典精读系列)
ISBN 7-309-04767-2

I. 史… II. 陈… III. 史记-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1426号

史记精读

陈正宏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韩结根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
字数 234千
版次 2005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100

书号 ISBN 7-309-04767-2/K·168
定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陈思和 汪涌豪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选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

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以概尽的。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和根源性究问。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然而,受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还有陈旧的教学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史迹的复现、概念的宣教和理论的灌输,一个中文系学生(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大抵同此)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教养,并未被当做重要的问题认真讨论过。课程设置上因人而来的随意,课程分布上梯次递进的失序,使这一学科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位序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形,更不要说其自在性和特殊性的绾聚与凸现了。也就是说,它的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偶合的,因此既不尽合理,带连着学科品性也难称自觉与独立。在这样情况下,要学生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形成对汉语言文学相关知识的完整认识几无可能。即使有大体上的认知,也终因缺乏作品或文本的支撑而显得肤泛不切,不够深入。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三年前,我们开始在中文系本科教学中实施精读经典作品的课程改革。调整和压缩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保证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集中精力攻读一二十种经典原著。具体做法是选择其中重要的有特色的篇目,逐字逐句地细读,并力求见迹知远,举一反三,然后在三四年级,再及相关领域的史的了解和理论的训练。有些比较抽象艰深的知识和课程被作为选修课,甚至放在研究生阶段让学生修习。我们希望由这种“回到读书”的提倡,养成学生基本的专业教养。有感于脱离作品的叙述一直占据讲坛,而事实是,历史线索的了解和抽象义理的铺排都需要大量的作品阅读做支撑,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很难展开深入有效的学习,学生普遍认同了这样的教改,读书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有的就此形

成了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再引导他们“回到感性”,在经典阅读中丰富对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最终“回到理性”、“回到审美”,养成清明完密的思辨能力,以及关心人类精神出路和整体命运的宽广心胸,关注一己情趣陶冶和人格修炼的审美眼光,由此事业成功,人生幸福。我们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庶几比较切近“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的本义。

现在,我们把集本系老中青三代教师之力编成的原典精读教材,分3辑、每辑10种成系列推出,意在总结过往的教学实践,求得更大更切实的提高。教材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理论”、“比较文学”和“古代文献学”等七大学科点,选择三十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做精读,其中既有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史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言说背景,本身就极富文学性,同时也包括国外有关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此涵括古今,兼纳中外,大概可以使中文学科的专业知识有典范可呈现,有标准可考究。

在具体的体例方面,教材不设题解,以避免预设的前见有可能影响学生自主的理解;也不作注释,不专注于单个字词、典故或本事的说明,而将之留给学生课前的预习。即使必须解释,也注意力避“仅标来历,未识手笔”的贫薄与单薄,而着重隐在意义的发微与衍伸意义的发明。也就是说,但凡知人论世,不只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义,还力求与作者“结心”和“对话”。为使这种发微与发明确凿不误,既力避乾嘉学者所反对的“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主观空疏,又不取寸步不遗、不明分际的单向格义;相反,在从个别处入手的同时,还强调从汇通处识取,注意引入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观念和解说方法,以求收多边互镜之效。即使像文本批评意义上的“细读”(close reading),也依所精读作品性质的不同而适当地吸取。尤其强调对经典作品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抉发,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阐幽发微,上挂下连,古今贯通,中外兼顾的特色。相信有这种与以往的各类作品选相区隔的文本精读做基础,再进而系统学习文学史、语言学史以及文学、美学理论等课程,能使本专业的学生避免以往空洞浮泛

的知识隔膜,从而对理论整合下的历史与实际历史之间的矛盾有一份自己的理解,进而对历史本身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并从内心深处产生浓郁而持久的“温情与敬意”。

如前所说,原典精读教材的编写目的,是为了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教养的范本,它们应该是这个专业的学生知识准入的基本条件和底线。但是“应该”与“能够”从来是一对矛盾。如何使教材更准确简切地传达出经典的大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得体新生命,得入新世界,是我们大费踌躇的问题。好在文学的本质永远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影响过程中,学术的精神也永远存在于学术著作的解读当中。既如此,那么从原典出发,逐一精读,既沉潜往复,复从容含玩,应该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思路。

我们期待基于这种思路的努力能得到丰厚的报偿,也真诚地欢迎任何为完善这一思路提出的建议与批评。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讲 殷本纪	14
第二讲 六国年表(节选)	41
第三讲 河渠书	63
第四讲 越王句践世家	85
第五讲 伯夷列传	116
第六讲 刺客列传	133
第七讲 刘敬叔孙通列传	173
第八讲 太史公自序	197
参考文献	240

导 论

《史记》是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之际诞生的一部总字数达五十二万余字的中文巨著。它的作者，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于公元前145年抑或前135年，出生在一个名叫夏阳的地方^①，其地位于九曲黄河那硕大的“几”字字心的右下侧，相当今天的陕西韩城南。不过大概还在少年时代，他就随父亲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不远的茂陵——那是汉武帝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而特设的一个新城镇——并从茂陵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司马迁晚年曾自称：“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报任安书》）可见他天生是个不受羁绊的人。大约二十岁前后，他开始浪迹天涯，游历南北。不久他得到一个充任汉武帝低级侍卫“郎中”的任命，并在该职的任上，

^① 有关司马迁的出生年代，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讲解部分有更详细的解说，可参阅。此外，本篇导论以下有关司马迁生平的叙述，还参考了《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其中全文收录了司马迁晚年所作《报任安书》），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朱维铮《司马迁》的相关考述。《汉书·司马迁传》见中华书局1962年刊《汉书》标点本，第2707—2739页；《太史公行年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2册，第481—514页；《司马迁》载《十大史学家》第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奉使远征西南的巴蜀等少数民族。而他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仕途升迁,是在汉武帝的元封三年(前108),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主管天文历法、兼涉文书档案的太史令。

司马迁在太史令任上主持过修造新历法(后来称为《太初历》)的工作,但他最重视的,却是一项由他父亲草创、主要由他个人从事的非官方事业。这事业的最终成果,便是大约完成于征和二年(前91)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而此时的司马迁,已经在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的任上了。

不过《史记》的撰述,对司马迁而言,其实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顿与危难的;而司马迁最终的死,或许也跟此书不无关联。

所谓困顿与危难,是指《史记》撰述到一半时发生了著名的李陵事件,司马迁因替出击匈奴兵败投降的将军李陵辩护,结果被汉武帝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被免一死,时在天汉四年(前97)。而司马迁之所以宁可屈辱地生,也不从容地死,据他后来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完全是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撰述《史记》。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晚年写给曾任益州刺史的任安的一封信,据考写信的时间,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的十一月,当时任安已经卷入汉武帝后期爆发的巫蛊案,被判死刑,行将处决。由于前此任安给司马迁写信,表达了希望老朋友“慎于接物”、以“推贤进士为务”的愿望^①,而司马迁因故未能及时作复,这时考虑到朋友即将诀别,故特草此信,以表心迹。其中直接关涉当年他自己宁受腐刑而不就死的,是如下一段: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百三十篇”指《史记》的总篇数,“此祸”即李陵事件,“极刑”自然是指腐

^① 任安给司马迁的原信已佚,这是根据《报任安书》的转述而获知的。

刑。而也就是在这封《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再度提出了前贤因“发愤”而著述的说法，以暗示自己的撰述《史记》，与前者实有同样的内在缘由^①。而直到二十世纪都非常流行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语，亦出自该信，其中表达的，显然是一位已经超越生死荣辱的哲人的深邃的人生思考。

《报任安书》按常理推断，是应该送至任安所在牢狱的。但已被判处死刑的任安，是否有幸在临终前读到老友的这一封回信，则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司马迁写了《报任安书》以后，便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东汉时期就有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的传说^②，联系《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阅，因其大怒而遭削除^③，又《报任安书》暗示《史记》乃“发愤”之作，且其中颇有“怨”语等史实，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很可能在汉武帝的淫威下，死于非命。而我们看《汉书·司马迁传》，其中虽然不提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而篇末班固的赞语里，却殿以“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一句，似乎话里还有不便明说的话语在，则上述的推测，恐怕不无道理^④。

二

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虽不能确证，但他以生命写就的《史记》一书，却几经曲折，流传了下来。

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独特面貌的巨著。其中叙写的，是上起

① 《报任安书》云：“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按《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有类似的段落，详本书第八讲。

② 详《史记·太史公自序》之《集解》引东汉卫宏《汉旧仪注》。

③ 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中十二本纪叙录部分的讲解。

④ 司马迁的卒年，迄今仍无定说。清王鸣盛以为当卒于昭帝时，见《十七史商榷》卷六；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以为“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按汉昭帝在位的年代当于公元前86—前74年，汉武帝则卒于其前的后元二年（前87）。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

全书一百三十篇,按如下五种标明名称的体裁,依次分为五大部分,构成一个纵横交织、相互呼应的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

“本纪”十二篇:以天下时势变迁为依据,以史事编年为形式,顺次叙录历代传说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事迹。起于谱系传说中上古帝王的《五帝本纪》,终于记载作者当时天子汉武帝事迹的《今上本纪》^①。

“表”十篇:综合传统的“历”与“谱”,以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国别纵横谱系历史事件的出没与重要人物的浮沉。其中又按记载的详略,分为粗阔的世表(《三代世表》)、较精致的年表(如《十二诸侯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和颇严密的月表(《秦楚之际月表》)三类,而以年表为主。十表的排次顺序,与十二本纪大致相当,而所登录的事件与人物,要比本纪更多,也更概括。

“书”八篇:以专题的形式,系统地叙录一事的制度及其变迁。其中既有论礼乐制度的《礼书》和《乐书》,也有述天文、历法与宗教的《天官书》、《历书》与《封禅书》,还有记兵制、水利和经济的《兵书》^②、《河渠书》、《平准书》。

“世家”三十篇:以编年、传记或二者结合的形式,叙写历史上各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同时为表彰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也破例安排了《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这样的篇章。

“列传”七十篇:以传记的形式,传写古今各式独具代表性的人物、民族的事迹。按其性质,可分为以人为纲和以事为统两大类。以人为纲者中,又可按其传主的多寡,分为个人传记的“独传”,和数人合为一篇的“合传”两种,前者如《孟尝君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后者像《屈原贾生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之类便是;以事为统者亦称“汇传”,其代表,则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匈奴列传》等。

^① 司马迁原作《今上本纪》已佚,后人取《封禅书》而改“今上”为“武帝”充数,是即今本《史记》中的《武帝本纪》。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有关讲解。

^② 司马迁原作《兵书》也已亡佚,后人取《历书》中论律部分,和续撰的论兵文字合篇,是即今本《史记》中的《律书》。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有关讲解。

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①，但一般认为，根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生前已经完成了这一体大思周的巨著的撰写，并且分写两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也就是正本自家妥为收藏，而副本送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

但是司马迁死后，这部一百三十篇的大书中的部分篇章，却佚失了；幸而未失的部分，也出现了后人添改的痕迹。

最早提到《史记》已有缺失的，是《汉书》的《司马迁传》，其中节录《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有“十篇缺，有录无书”一句附记。所谓“有录无书”，是指十篇的篇名，在《太史公自序》的全书目录部分有，而到班固的时代所见的《史记》中，这些篇章已经亡佚了。后来唐代的颜师古给《汉书》作注释，在班固的那句话下，又引证了三国时代魏国张晏的如下一段说明：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据此一般认为，到东汉时期，《史记》已经有所佚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之所以还是一部完整不缺的书，是因为在汉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之际，一位名叫褚少孙的儒生，对《史记》进行了补撰——事实上据考先后参与补撰的，绝非褚氏一家，而那些被张晏定为褚少孙补撰的篇章，也未必全都出自褚氏之手^②。

不过褚少孙倒确实在司马迁已完成的某些篇章后面，添加了他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均以“褚少孙曰”起首，以跟《史记》原文相区别，而文辞倒也未必“鄙陋”^③。又我们翻阅今本《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如《司马相如列

① 如南宋朱熹曾云：“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四，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

② 参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第1—108页，中华书局，1963年。

③ 本书第三讲《河渠书》的讲解部分，引述了《史记·滑稽列传》后半褚少孙所撰的西门豹故事，即其例。

传》末的“太史公曰”，其中还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的话，那恐怕既不是司马迁的原稿，也不是褚先生的补笔，而很可能是后人取《汉书·司马相如列传》末的班固赞语补缀进去的了^①。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流传到今天《史记》，其中混杂有后人补撰添改的文字，但就总体篇幅而论，司马迁的原文，在全书中仍占绝对主导地位。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去探讨司马迁当年的著述心曲。

三

司马迁撰述《史记》的终极目标，无疑是我们上面已引过的《报任安书》里的那句名言——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其中所谓“通古今之变”，当即以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的变迁大势，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变”字。关于这点，我们在下面第三、第七和第八讲的讲解中，多有讨论，此不赘述。但“究天人之际”与“成一家之言”两条，或意深难明，或容易误解，有必要在此作稍微详细的解说。

按“究天人之际”的说法，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篇末，讲到八书的撰述宗旨时，也曾提及。只是那里“天人之际”四字指代的，是《天官书》一篇的大要。而作为全书的撰述目标之一，据现代学者研究，它实与古奥的天文历法计算有关，其中又牵扯着司马迁个人特殊的天人感应观念^②。其关键，则在《天官书》的如下一段话：

① 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

② 以下有关“究天人之际”的解说，是根据朱维铮《司马迁》一文的相关考述撰写的。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是基于当时制定历法时，谐调阴阳合历中的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的实践，而得出的半科学半神学的结论。

说其中有科学，是因为它背后支撑的理据，包含了如下一类精密的计算结果：在制定历法的计算周期时，若小于“一统”（1539年），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相除所得的总日数便无法除尽；而要使回归年、朔望月和干支六十周期等相会合，最少需要“三统”（4615年）。研究发现，上引司马迁话中的“一纪”（传统天文学术语，等于1520年），和“一统”的年数大致相当，相应地“三纪”（4560年）则跟“三统”的年数大致相当。如此“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自然变化规律的有效发言。

说其中有神学，是由于司马迁接着所说的“为国者必贵三五”，也就是当国执政者一定要尊崇三个五百年（即一纪）的大变周期，其最终目的乃在附会现实政治。尽管由于天文历法学的发展，当时已经了解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知晓木星、土星和火星每隔五百余年将会合一次，而同一年金星与水星也会转至会合点附近，出现所谓“五星毕聚”的天文奇观，但司马迁等具有占星术信仰的知识者更看重的，却是这一会合所寓示的天人感应、人间五百年必有大变的政治预言。然而对于“天人之际”所作的这番穷追深究，既带有如此浓烈的宿命色彩，则其最终结论的无法切中实际，又是必然的了。

相比之下，“成一家之言”似乎最容易理解，而事实上又最容易被误解。

按通常的解释，“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企图借《史记》发表他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见解。但如果我们联系《太史公自序》，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可能是，这里所谓的“一家”，并非单指司马迁个人，而是指与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可以分庭抗礼的别一家^①。这别一家

^①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引。

言论的现实发言者，以《史记》的文本实际而论，自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且司马迁的笔墨，可能要比乃父的多得多。但这别一家的精神所寄，也就是其隐含的发言者，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恐怕不仅包括他们父子，还应当涵盖所有曾在历史中显示了其存在价值的司马氏家族成员。因为司马氏家族乃天官世家，周史后代，近世又执掌太史令之职，负有沟通天人关系的崇高使命，而职守所及，又熟悉并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文献^①——《太史公自序》有“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语，即其证——所以他们有资格也有可能，以神情遥接的方式，共同在特定的撰述领域里“成一家之言”。

对于《史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标，当作如上的理解，还可以从司马迁当初给他的著作所定的书名——《太史公书》，得到旁证。

按“太史公”一词，在《史记》中出现频繁，有时指代司马谈，有时又指代司马迁，历代研究者因此亦有多种解释。在我们看来，诸家说法中，《史记正义》释《太史公自序》时所引虞喜《志林》一说，最为合理——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

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也。

这意思是说，上古时候主管天官事务的地位都很高，有“公”的头衔。从周朝到汉朝，这官职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表面上朝廷朝会的时候，天官的座位还是排在“公”一等的位置上。因为人们尊崇上天，所以还是常用旧式的“太史公”这一尊称，来称呼在天官任职上的官员。

据此，“太史公”显然不是司马谈或司马迁当时任职时的正式官名（正式的官名是太史令），而只是一个与之相关的古称。在很多的情况下，它还是一种泛指，但凡曾任天官的，即可以此旧名来称呼。所以《史记》里有些明显出自司马谈的话，仍标“太史公曰”。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司马迁完成《史记》，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里郑重写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一句时，他已经不在太史令的职位上，而是中书

^① 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及其有关讲解。

令了^①。则他依然以《太史公书》名其作，显然是向世人与后人昭告，他这一部巨著中所叙写的，不单是个人的心曲，更是他的家族——也就是所谓天官世家、周史后代——的共同心声。

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终极目标下，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具体方法，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见《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其程序，不外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搜集尽可能详备的资料（包括文献记录和口述史料），一是对所得资料加以排比、整理与传写。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史记》中，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多次将孔子删削《春秋》的话头提出来，似有意似无意地作其撰述《史记》的对比。虽然表面上司马迁曾声称《史记》无法与《春秋》相提并论，只是“述”而非“作”，事实上他却已经超越孔子，以述为作；他还在《报任安书》中声明，自己身遭腐刑而坚持著述不辍，原因之一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见他对自己著述的“文采”，也是十分看重的。

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实，与上面讨论的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史记》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史记》一书，正如梁启超所说，其实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②。这一家之言，以实现天官世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崇高职业理想为旨归，以全方位地搜求、整理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系统完整地描绘丰富的历史现象为结撰方式，同时又以充分显示司马迁个人的独特文采为书写策略。在当时的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一部书，肯定不被视为是“史记”，因为这名称即使到西汉时期，依旧主要是指那些枯燥零碎的诸侯历史编年档案；这样的一部书，自然也不会被看作是游戏笔墨的文学辞藻集，因为其中显然负载着太多太沉重的人生痛

^① 或以为司马迁任中书令时，仍兼任太史令，并举《文选》本《报任安书》卷首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为证，详张鹏一《太史公年谱》卷首所收《吴敬之来书论史公卒年》，民国间在山学堂刊本。但《报任安书》既自称“太史公”而不书正式的官名“太史令”，正说明司马迁已经不在太史令的任上。又“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句中的“牛马走”，实为“先马走”之讹，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394—395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②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收入《饮冰室合集》第9册，中华书局，1989年。